

智效民 • 著



国之立，在于有魂，是谓国魂
大学之立，在于有魂，是谓大学之魂

大学之魂

民国老校长

中國華僑出版社

大学之魂

民国老校长

智效民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之魂 : 民国老校长 / 智效民著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12.4
ISBN 978-7-5113-0774-3

I . ①大… II . ①智… III . ①高等学校 - 校长 - 生平事迹 - 中国 - 民国
IV . ①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5690 号

●大学之魂 : 民国老校长

著 者 : 智效民

出 版 人 : 方 鸣

责任编辑 : 华 轩

封面设计 : 石 婧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635mm × 965mm 1/16 印张 : 15.75 字数 : 200 千字

印 刷 : 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774-3

定 价 : 32.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 100028

法律顾问 :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 (010) 82068999 传 真 : (010) 82069000

网 址 : www.oveaschin.com

E-mail :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拙著《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即将付梓，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一下它的来历。

大约十年前，我的朋友丁东、谢泳和复旦大学的夏中义、南开大学的李新语在编辑《大学人文读本》之余，又参与创办了《大学人文》杂志。该杂志面世后，因为保持了《大学人文读本》以思想文化见长的编辑特色，并能对现实和历史问题发表独立评论，所以在大学校园乃至整个社会颇受关注。

不久，谢泳约我为《大学人文》写一篇关于“胡适是怎样当大学校长”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可能是反响还行吧，他让我再写几篇，于是我又写了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几位。当时恰逢资深出版人刘硕良退休来到北京，创办一个文化公司，并出版了好友赵诚写的《长河孤旅》等好书。那年夏天，我从太原来北京看望儿子，丁东告诉我刘先生想约我吃个便饭。见面以后，刘约我在前面几篇文章的基础再写几位，于是我又写了罗家伦、任鸿隽和胡先骕，再加上过去写的竺

可桢，遂以《八位大学校长》为名，交差了事。

说实话，我写八位大学校长虽然比较仓促，但因为他们鲜为人知，更因为他们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了某种参照，所以该书问世以后反响比较强烈。一位研究民国史的专家认为：“现代中国的大学体制建立之初的几十年间确实获得过比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抗战八年烽火硝烟的熏染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这其中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而手头这本《八位大学校长》就比较好地讲述了这些大学校长的经验、见解与能力，很值得我们仔细阅读。”

相比之下，一位普通读者的评论更让我感动。这位读者说：“最近看得最入心的一本书——《八位大学校长》，里面说到很多问题和观点对我启发不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大学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什么？学生应该在大学里‘得到’什么？办大学是为了什么？”随后，他还从书中摘录了数十条大学校长的语录，其中他最喜欢的是竺可桢的一句话：“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一个写书的人，能够遇上如此知音，得到如此共鸣，是一件非常荣幸、非常快乐的事情。

如今该书原有的版权合同已经到期，因此有多家出版机构与我联系再版事宜。最后，我选择了铁葫芦图书作为合作对象。为此，我对原稿作了如下处理：第一，为了让八位大学校长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生动，我把近年来写的一些相关文章作为附录添了进去；第二，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我对原稿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第三，为了更直观、更准确地表达主题，将书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一直以为，民国老校长乃至民国教育史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它需要深入挖掘、独立研究、热情支持、广泛关注。在这方面，我虽

然才疏学浅，却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最后想说的是，今年是父亲智力展诞辰一百周年，愿以此来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思念。

智效民

2012年清明时节

于北京昌平名流花园寓所

◇ 目 录 ◇

自序 001

蒋梦麟 「北大功狗」 001

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胡适 民主自由治校 035

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梅贻琦 「清华的名片」 067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张伯苓 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 101

一个人只有到死的时候，才会腐化，活人是不应当腐化的。

竺可桢 「浙大保姆」 127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我们应该学习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经验，既要「教」，又要「训」。

任鸿隽 科学救国梦 141

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如果在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罗家伦 政治家如何治校 175

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

胡先骕 不该遗忘的老校长 215

人类的基本要求是生活的安全与自由，凡与此潮流相反的政治力量都绝不能长久存在。

蒋梦麟
“北大功狗”

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
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
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
会。



蒋梦麟(1886—1964)，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在北大工作了二十余年，系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64年病逝于台北。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子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19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蒋梦麟为什么会成为他所谓的北大“功狗”，其实也是北大功臣呢？这与他的早年经历、教育思想和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关。

一、早年经历

1. 兴趣与理想

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后来他在浙江高等学堂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才改名梦麟。

蒋梦麟的祖父在上海开过钱庄，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是

当地绅士，喜欢发明创造，曾经仿照西洋模式盖过一座洋楼，还造过一艘轮船。楼是盖成了，但轮船却因知识不足而失败。因此，他“一心一意要让他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新潮·新潮》第40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蒋梦麟五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那种死板的读书生活，曾经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对于小孩子的这种恶作剧，他的继母和先生都没有当真。这也可以看出当年的人们在教育孩子时，心态非常从容。

尽管没有挨打，但蒋梦麟还是回到私塾，继续那苦不堪言的读书生活。他说：“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忍受监狱似的煎熬。他还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上，第31页）

平心而论，蒋梦麟最初的理想还是属于传统的一种个人奋斗，但是这种个人奋斗是与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任鸿隽与四川大学》一文中，曾经引述陈衡哲对女儿任以都说过的一段话，也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以都因为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但陈衡哲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

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直到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他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12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蒋梦麟比任鸿隽夫妇略大几岁，士大夫气质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

2. 思考与研究

据蒋梦麟说，他的童年教育有三个来源：一是念古书；二是听故事；三是观察大自然。这些经历养成了他的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再加上他喜欢思考，讨厌死记硬背，才有后来的成就。十二岁以后，蒋梦麟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浙江高等学堂求学，并于十八岁考中秀才。在绍兴中西学堂时，蔡元培正好是那里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没想到十几年以后，他居然会协助蔡元培主持北大。

南洋公学对蒋梦麟的影响也很大。该校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的意见，一方面实行斯宾塞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一方面又开设中学、西学课程。中学课程以《四书》和宋明理学为主，西学则包括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新兴科学知识。蒋梦麟在这所学校不仅认识到研究学问必须有强健的体魄，还开始对中外道德进行比较研究。他说：“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么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他还说，通过比较研究，他开始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这样一来，传统信仰就再也不能左右他的思想和行为了。他说这是自己“思

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从此，蒋梦麟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先救自己。于是他“决心努力读书，努力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西潮·新潮》第67页）他觉得这才是儒家所谓修身的正确途径。

从蒋梦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思考是他研究的起点，研究是他思考的继续。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思考和研究兴趣，但应试教育却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现成的知识，根本不需要他们怀疑、思考和研究。这其实是在扼杀学生的天赋与智慧。另外，许多人把研究看得过于神秘，以为那是学者专家的事，也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记得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如果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话，那么中学和小学研究点低级粗浅的学问总可以吧。有了这种认识，才能改变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模式。

3. 育物与育人

蒋梦麟二十二岁时曾经去日本参观，深感日本教育的普及是其跻身于世界强国的主要原因。第二年他赴美国留学，在“以农立国”思想的指导下选择了农学。一位朋友对他说：“除非我们能参酌西方国家的近代发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否则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这位朋友还说如果不改学社会科学，你的“眼光可能就局限于实用科学的小圈子，无法了解农业以外的重大问题”。（《西潮·新潮》第77页）蒋梦麟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大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听了这些话以后，他开始动摇了。正在这时，他下乡实习，看到一群活泼的孩子去上学。这情景也许触动了他的童年记忆，让他突然觉得与其研究如何培育植物，不如研究怎样培养人才。于是他决定放弃农学，改学教育。这样一来，他的兴趣也更加广泛，选读的书籍扩大到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这种因为理想、兴趣而导致的专业改变，与鲁迅、

胡适的情况颇为相似。

在美国，他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上。研究过程中，他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欧美的东西，这使他发现古希腊文化及其自由教育在西方现代文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利用旧知识来获得新知识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我们可以对他说飞机就像一只鸟，或者像一只长着翅膀的船。假如这个孩子连鸟和船也没见过，要让他了解飞机就困难了。同样的道理，要想让中国学生了解西方文明，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因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方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同上，第81页）。这也提醒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出国的留学生，之所以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也无法与20世纪初的欧美留学生相比，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了解。

说到这里，蒋梦麟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幼学琼林》。他说这是一本启蒙读物，它不仅押韵，内容也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草木虫鱼，到商业、农业、科学发明，甚至政治哲学，几乎无所不包。记得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过这本书，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最近我在旧书市上也看到过这本书，版本很多，可见它是一百年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二、教育思想

1. 体育与美育

蒋梦麟初到美国，就读于加州柏克莱大学。该校环境非常幽美，课余生活也很丰富。“离剧场不远是运动场，校际比赛和田径赛就在那里

举行。青年运动员都竭尽全力为他们母校争取荣誉……‘健全的心寓于健全的身’——这就是古希腊格言的实现。”另外，校园的一个大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裸体雕像，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她们忸怩作态的习惯”，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同上，第82页）

在美国，他还逐渐认识到“美是希腊做人的中心点”，正因为这样，才产生了美学和许多伟大的美术作品，从而使古希腊文明成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因此，把体育和美育结合起来，让它们齐头并进，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看，把体育和美育当作一种“素质教育”，仍然带有功利主义的印记。这也是蔡元培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的主要原因。

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教授。关于实用主义，他记得老师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同上，第92页）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中心，因此他经常到乡下度假。他发现在乡下住久了，回到城市就有一种愉快感；在城市住久后，到了乡下也会感到清新可爱。这是因为环境改变会引起心理变化，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所谓“审美疲劳”吧。

1917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在此期间，他发表过大量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智育、体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极。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



约翰·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创始人，1919年至1921年曾来中国讲学。自称其哲学为经验自然主义和工具主义。